

·近现代学人与百年国图·

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藏书目录

张廷银

从宣统二年(1910)九月赴京就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到宣统三年(1911)九月乞假寓居上海,缪荃孙(1844-1919)在京师图书馆任职差不多一年时间。在此期间,缪荃孙除了参与日常的图书馆事务,最主要的精力用于整理藏书和编制藏书目录,为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与书籍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主持编订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和《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则不仅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京师图书馆建馆初期古籍收藏的重要依据,也为各图书馆编制古籍目录提供了良好的典范。

一、京师图书馆即“清学部图书馆”

缪荃孙在京师图书馆所编纂的两部书目都冠以“清学部图书馆”之名,那么,两部书目所著录的是否就是京师图书馆的藏书呢?因为确实有个别材料所说的学部图书馆,就与京师图书馆完全无关。比如袁英光、刘寅生编纂的《王国维年谱长编》,据樊炳清《王忠愍公事略》中“三十二年(1906)丙午,学部奏调参事(罗振玉),因荐公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辑和名词馆协修”几语,而认定光绪三十三年夏历三月,王国维由海宁北上抵北京,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馆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①。因为王国维从未在京师图书馆任职,因此,“学部图书馆编辑”云云,就让人感觉似乎在京师图书馆之外,学部还曾单独有过一个图书馆。事实上,这里的“学部图书馆编辑”准确含义即是在学部里任图书馆编辑。按照《学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缺额折》,学部当时拟设五司十二科。五司分别是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和会计司。总务司下的审定科“掌审查教科图书,凡编译局之已经编辑者,详加审核颁行。并收管本部应用参考图书,编录各种学艺报章等事”^②,这些事务皆与图书有关。而且,王国维既然是在总务司上行

^①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②《大清光绪新法令》第3册,商务印书馆第5版,第37-41页,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走,所谓“图书馆编辑”应该就是总务司审定科所从事的业务,是属于学部内部的图书编辑,而不是对外的某个图书馆的编辑。不能据此认为王国维曾经在学部的图书馆里担任编辑。独立的“学部图书馆”其实是不存在的。

再从缪荃孙、曹元忠等京师图书馆人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学部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就是一体的,区别仅在于。“学部”就隶属言,“京师”则就位置言。缪荃孙在《艺风藏书续记缘起》中概括其从辛丑(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庚戌(宣统二年,1910)间的经历时就说:“先后游日本东西京,又观书于四明天一阁,领江南、学部两图书馆,颇见异书。”^①将学部与江南两图书馆并列,证明他所谓的学部图书馆即京师图书馆。曹元忠致缪荃孙函又说:“惟闻学部图书馆业已却聘,未能安车北上,殊为怅惘。”^②所指即缪荃孙不肯继续接受京师图书馆监督之聘任。

将缪荃孙所编《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与民国二年江瀚主持编纂的《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相比,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如经部之《汉上易集传》一书,《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该书为“宋刊本”,而且有“晋府书画之印”朱文钤记,存三之十一,这与《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的著录完全一致。《大易粹言》一书,《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为“宋曾穉撰,宋刊本”,并指出《宋史·艺文志》作十卷之误以及存六十之六十七的情况,而《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亦作“宋曾穉撰,宋刊本,刻甚精。《宋史·艺文志》作十卷,盖误。存六十之六十七。”基本可以看出,凡是《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都有著录,而且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这就更能说明,《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虽然不以京师图书馆冠名,但反映的就是京师图书馆的最初藏书。

二、缪荃孙编纂《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作为一个学者和藏书家,缪荃孙非常重视编纂藏书目录。因为书籍有聚合,必然也有流散。藏书家的任务不仅在保存书籍,亦当留存书籍信息。缪荃孙在说明编纂藏书目的缘起时就说:“他日书去而目或存,挂一名于艺文志,庶不负好书若渴之苦心耳。”^③在编辑《艺风藏书续记》时又说:“隐湖之易参,虞山之挥泪,前型具在,何敢怨尤,至于书去目存,昔贤以之慰张金吾者,吾亦藉之以自慰也。”^④“书去目存”的认识成了缪荃孙编纂藏书目录的重要指导思想。相对于私藏,公藏图书流散的可能性也许会小一些,但缪荃孙依然觉得编辑目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目录除了记录收藏结果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便

①《艺风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②《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86页。

③《艺风藏书记·藏书记缘起》,第3页。

④《艺风藏书续记缘起》,《艺风藏书记》第207页。

于检索和观览,他在《艺风藏书续记缘起》中曾介绍,张之洞看到他编的《艺风藏书记》就问到:“不畏人指名而索耶?”缪荃孙则回答:“本是待贾而沽耳。”^①私藏如此,公藏有保存与流通之双重目的,就更应该编制目录。可能就是出于这些考虑,缪荃孙 1910 年 9 月履职京师图书馆监督后,就将很大的精力投入《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和《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的编纂工作中,影响最大的自然首推《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

关于缪荃孙编纂《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过程,在其《艺风老人日记》中有多处记载。如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己未“到馆,定史部目”^②;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甲寅“写善本书目”^③;二月十四日癸未“编善本目录”^④;二月十七日丙申“编目录经部小学类”^⑤;十九日戊戌“编史部金石类、目录类、子部类书类”^⑥;廿一日庚子“编集部目”^⑦;廿二日辛丑“到馆,史部目成”^⑧;廿三日壬寅“编子部目”^⑨;廿九日戊申“校集部目,与熙之重写副本”^⑩;七月十二日丁丑“校善本目”^⑪;十五日庚辰“校史类目”^⑫;十七日壬午“定史部全目”^⑬;十九日甲申“补史部目”^⑭;廿七日壬辰“补子史两类书目”^⑮;廿八日癸巳“到馆,编释家目”^⑯;八月一日乙未“阅补集部旧目”^⑰;八月十一日乙巳“校史部目录”^⑱;十二日丙午“定总集目”^⑲。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宣统三年这一年里缪荃孙花了大量的时间,比较集中地进行了善本书目的编制和校订。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被邓实辑入《古学汇刊》第二集,民国三年由上海国粹学报社铅印出版。全书五卷,经部、子部、集部各一卷,史部分上下卷。因为这是近代以来第一部公藏书目,而且著录内容详尽,尤其是第一次明确地著录行款和版式,因此其藏书史价值和目录学意义都很显著。1916 年 6 月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向教育部呈文请求鉴定新编《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时,就指出分别由缪荃孙、江瀚和馆员王懋谔所编纂的三部书目中,“以缪本为最详”^⑲。不过,从现存《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所记录的信息,我们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缪荃孙古籍编目的基本精神和规范。

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书库中有两册缪荃孙编辑《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的稿本,编目员根据全书的笔迹,确定为抄写本。但书中几乎每一页都留下了缪荃孙亲笔校改和补充的文字,后来被编入《古学汇刊》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都是按照缪荃孙校改和补充而定稿,因此,这毫无疑问是其校正稿

①《艺风藏书续记缘起》,《艺风藏书记》第 207 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2337 页、第 2354 页、第 2362 页、第 2363 页、第 2364 页、第 2364 页、第 2364 页、第 2364 页、第 2365 页、第 2410 页、第 2411 页、第 2412 页、第 2412 页、第 2414 页、第 2414 页、第 2415 页、第 2417 页、第 2417 页。

⑲李希泌、张叔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16 页。

本。书前扉页处有署名庄尚严的一则墨笔题记：

数年前在护国寺街一小书店购得此目两本，查系前教育部京师图书馆编目稿本，虽残，亦可留。况有缪荃孙手迹，今谨赠国立北平图书馆。

此稿本是如何流入坊肆的不得而知，但从内容的不齐全以及前后顺序之颠倒，可以肯定其中必有人进行了一些改动而出现了混乱。

稿本《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虽然内容不全，但其中所反映的情况则非常值得重视。该稿本中原抄写的书目，多处原无版框说明，缪荃孙在校改时则基本都予以补充，如元刊《周易集说》，定稿中有“高六寸广四寸四分黑线口”，而这一条在稿本中是缪荃孙在页眉处亲笔所加；元刊《诗传通释》中“高六寸九分广四寸二分黑口”，也是缪荃孙后来校改所补。稿本中缪荃孙补充版框的情况还有很多，其中有些是写在页眉处，有些则旁批在行间。除了版框大小，缪荃孙还十分注意大小字数及藏书印等，在宋大字本《后汉书》的页眉处，他就很郑重地标注：“查大小字同不同。”显然是提醒自己或他人再去核实有关问题。而且原抄写作“行大小十六字”，缪荃孙则改作“行大十六字小二十字”，可见他确实亲自或请人对原书进行了认真的核对。宋大字本《汉书》，原来的抄写中无“首页有晋府图书之印”的藏书记录，是缪荃孙后补的。这些细节既反映了缪荃孙对古籍编目工作的认真审慎，也表明了他的古籍著录基本思想。因为判定或鉴别古籍版本，书框尺寸、行款格式以及递藏关系历来是很重要的依据。缪荃孙认为书目分两种：“一则宋槧明钤分别行款、刻书之年月，考流传之图记，以鉴古为高，以孤本自重，如《爱日精庐藏书志》、《艺芸精舍宋元书目》是也；一则涉猎四部，交通九流，蓄重本以供考订，钞新帙以备记载，供通人之流览，补秘府之缺遗。”^①而最好的书目则是二者的结合，他曾经对《积学斋藏书志》大加赞赏：“积馀此目，其书必列某本旧新之优劣，钞刻之异同，宋元本行数、字数、高广若干，白口、黑口、鱼尾、旁耳，展卷具在，若指诸掌，其开聚书之门径也。备载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复略叙校讎，考证训诂，簿录汇萃之所得，各发题解，兼及收藏家图书，其标读书之脉络也。世之欲藏书读书者，循是而求览一书，而精神形式，无不具在。”^②缪荃孙如此重视书籍的外在特征，说明他编制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用于检索的目录，而且是一个经过了考订尽可能达到精确的目录。他完成的不是一般的古籍著录工作，更包含了深刻细致的目录校勘学内容。这样的书目不但可以用于检书，还可以作为目录校勘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所以，我们说它是一部奠定近代藏书目录规范的著作。对于这部古籍书目，我们似不必毫无保留地相信其所有内容，《京师图书馆馆长夏曾佑呈送善本书目请教育部鉴定文》即认为缪荃孙所编书目“草创成书，不能无

①缪荃孙：《辛壬稿》卷二《平湖葛氏书目序》。

②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二《积学斋藏书志序》。

误”^①，但其严谨致密的编目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后来所编制的许多藏书目录，包括缪荃孙之后江瀚主持编纂的《京师图书馆善本简书目》和夏曾佑主持编纂的《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都不著录一书的版框、序跋，甚至连行款项都付诸阙如。这样的藏书目录固然无妨于图书馆了解自己的馆藏，但却十分不便于学者之利用。

稿本《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用印有“京师图书馆”字样的绿丝栏稿纸抄写，缪荃孙直接书写的条目也用此纸，这更说明缪荃孙清楚地意识到他就是在为京师图书馆编制善本书目。

三、缪荃孙编纂《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

差不多在编纂《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同时即宣统三年，缪荃孙也开始整理馆藏方志图籍，并编辑相关目录。缪荃孙自订年谱记载宣统三年“六月，编定各省志书目四卷”。《艺风老人日记》则有更详细的记载：三月十一日己未“到馆，检新运到志书”^②；十三日辛酉“到馆，检志书”^③；五月廿日丁巳“到馆，理志书”^④；廿一日戊午“到馆，理志书”^⑤；六月十一日丁丑“到馆，写安徽省志八十种”^⑥；十七日癸未“到馆……写山东省志书”^⑦；二十日丙戌“到馆，理江西志书”^⑧；廿四日庚寅“到馆，写河南志目”^⑨；廿五日辛卯“改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志目”^⑩；廿六日壬辰“到馆，写山西志目”^⑪；廿八日甲午“到馆，理浙江志”^⑫；卅日丙申“到馆，理直隶志”^⑬；闰月三日己亥“到馆，阅直隶、福建志”^⑭；六日壬寅“到馆，阅两广、四川志”^⑮；八日甲辰“到馆，理湖南志”^⑯；十三日己酉“到馆，理甘肃志书”^⑰；十四日庚戌“结各直省志书帐”^⑱；二十一日丁巳“校各省志”^⑲；廿二日戊午“送各省志书交装”^⑳；廿六日壬戌“到馆，补志例”^㉑；廿七日癸亥“整补志目”^㉒；七月十日乙亥“到馆，理书。送志目与梧生”^㉓。方志书目于宣统三年六月即告竣，而日记中此后仍有关于校订善本书目的记录，缪荃孙自订年谱也记载该年九月交善本书目八卷。这就表明，方志书目实际上先于善本书目而完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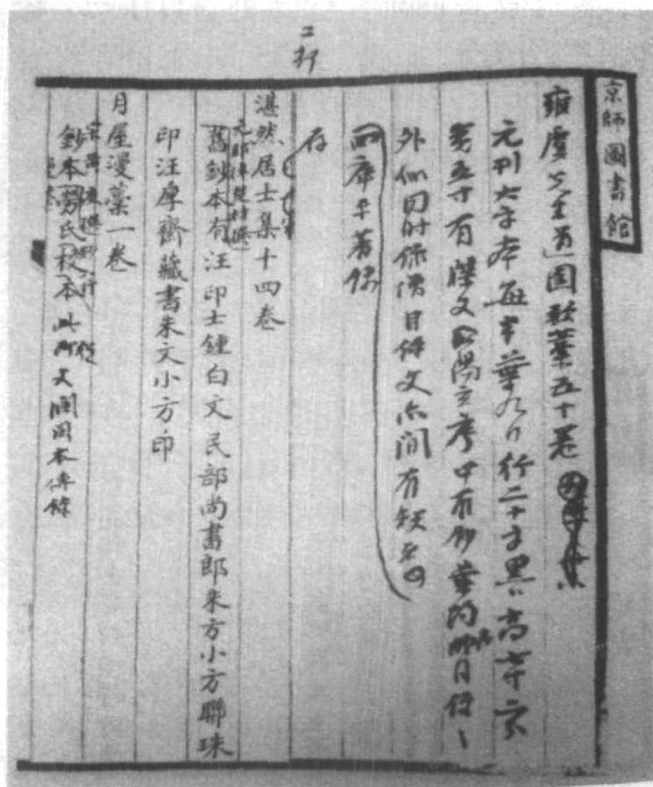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同被编入《古学汇刊》第二集。在该目“凡例”中，缪荃孙明确规定每种志书“记卷数、册数、主修人，年月有可考者必书”，事实上，除了以上内容，该目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记录——刊印时之题序。与善本书目相比，方志目少了行款和版框项，却比较注重对序作者的记录。缪荃孙如此处理，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明清以来的志书的版本特征已经不是非常重

①《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2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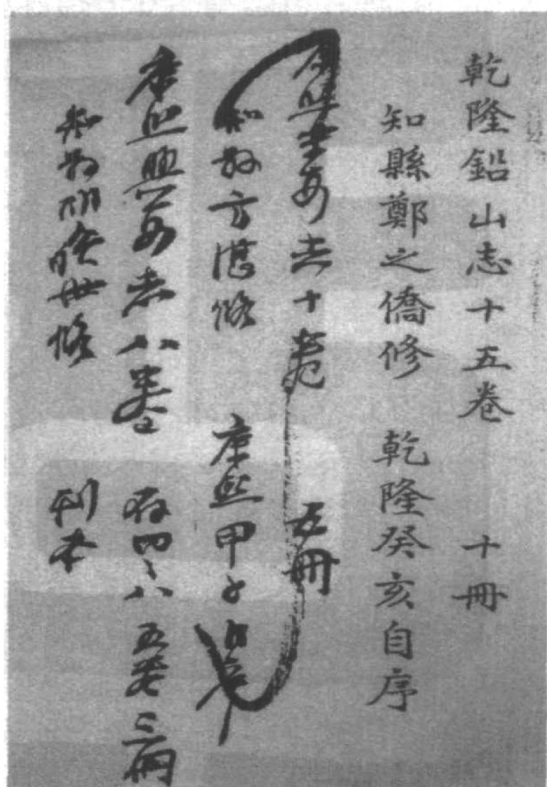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艺风老人日记》，第2368页、第2368页、第2387页、第2387页、第2393页、第2396页、第2397页、第2398页、第2399页、第2399页、第2400页、第2400页、第2401页、第2401页、第2403页、第2403页、第2405页、第2405页、第2407页、第2407页、第2410页。

要的内容,而其纂修者的情况以及序文信息则不仅关系修纂、刊行时间,亦有关于该志之编纂缘起、特点及意义等。所以,缪荃孙在方志书目中就没有再记录行款却比较多地关注序文作者。我们同样认为,缪荃孙的这种方志目录编纂思想是比较合理和完善的,其《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也可以视为方志书目之典范。后来的书目在著录志书时,有的记录了行款项却没有志序(如《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有的不但没有序作者内容,竟然缺少卷册数项(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这其实于志书的检索和研究都不尽合理。

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库中藏有4册《京师图书馆方志目录》的稿本,也是用印有“京师图书馆”字样的绿丝栏稿纸抄写。与馆中所藏之《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相比,方志目录抄写的笔迹更为俊逸流畅。各省志书的顺序为:直隶顺天、保定、河北、天津、安徽、山东为一册;甘肃、福建、浙江、江西、湖北为一册;山西、河南、陕西为一册;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为一册。各志之间的关系与《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基本一致。而且在《京师图书馆方志目录》中,亦有多处校改,改后的情况亦同于《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如:[崇祯]《固安志》在卷册数后,原抄作:“邑人苏志皋崇祯庚午知县秦士奇序”,校改为:“知县秦士奇修 崇祯三年刊本自序”;[康熙]《宝坻志》,原抄在卷册数后作:“知县牛一象修 邑人杜立德序”,校改则为:“知县牛一象修 康熙十二年刊本邑人杜立德序”,等等。稿本《京师图书馆方志目录》与定本《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文字上的这种关系,基本说明前者就是后者的校改稿本。再将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稿本

其中的校改笔迹与前述稿本《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中缪荃孙的笔迹相比，二者也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完全能够确定这部所谓的《京师图书馆方志目录》稿本，就是《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底本。“京师图书馆方志目录”几字书写在其中一册之封面上，笔体与书中的抄录文字以及校改文字均不类，估计是图书管理员或该书流传过程中经手者所书。之所以如此题名，可能是看到稿纸上印有“京师图书馆”字样，编目整理时又已时届民国。殊不知，缪荃孙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也是抄写在京师图书馆的稿纸上。题写者不做全面仔细的核对，率尔题名，几使艺风老人之手稿本隐没无闻。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采访目录记载，该草稿本 1958 年 4 月 15 日从修绠堂买来。修绠堂为陶湘（1871-1939，字兰泉）创办，聘请孙锡龄、孙诚俭先后经营。据《艺风老人日记》，缪荃孙与陶湘经常交换互赠书籍，稿本《京师图书馆方志目》也许即因此而流入修绠堂。但最终又回到图书馆，则实是大幸。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